

建筑师

73

1996/12

ARCHIT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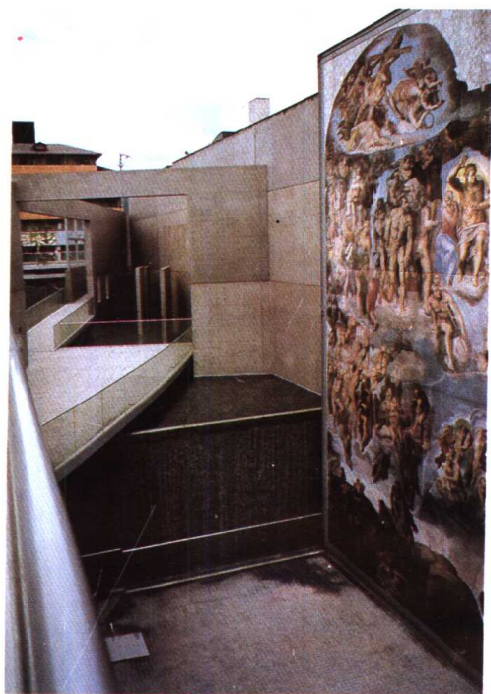
安藤忠雄建筑作品选



从庭院牧师住宅看光的教堂正入口



光的教堂室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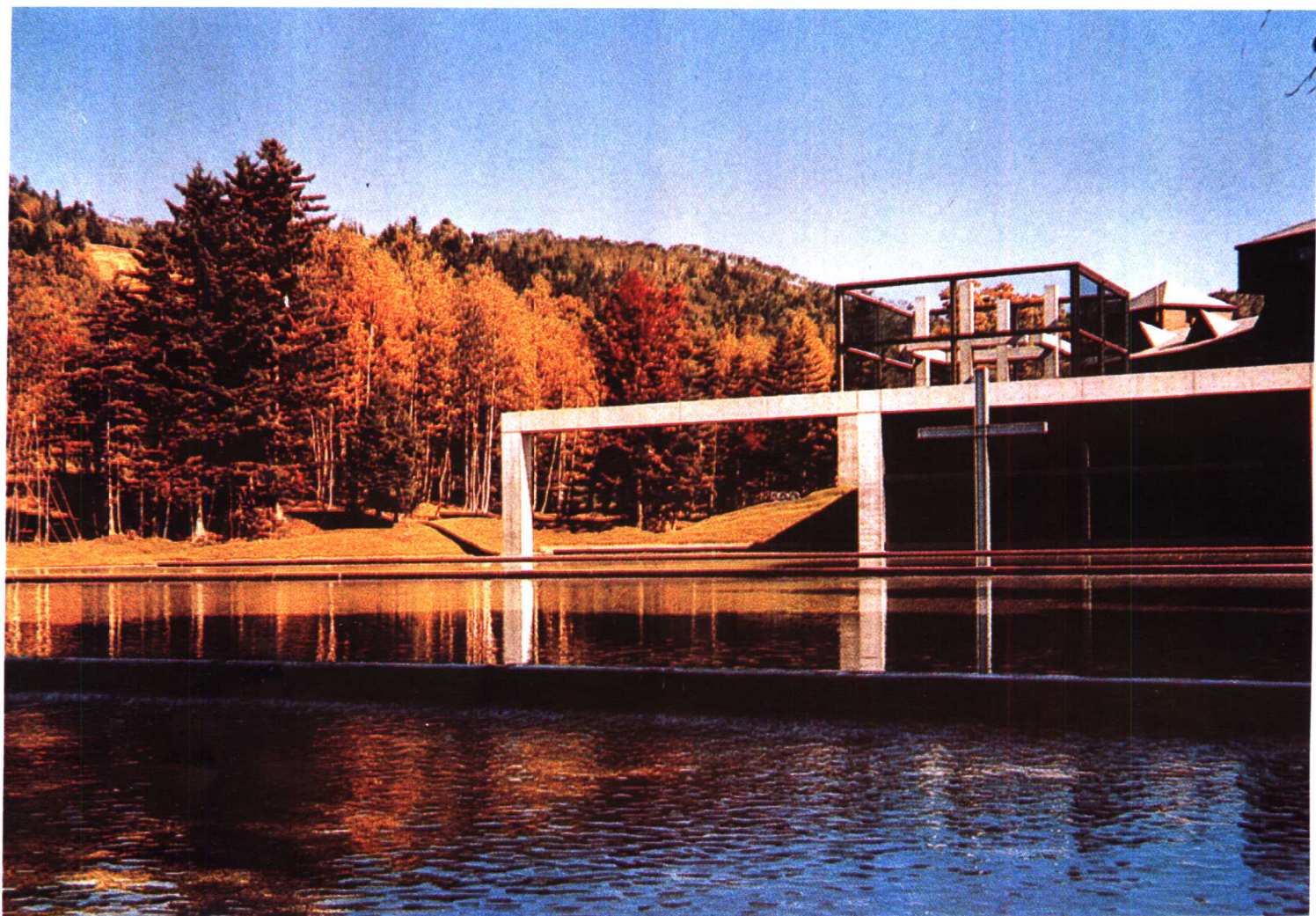


京都府立陶板名画展廊 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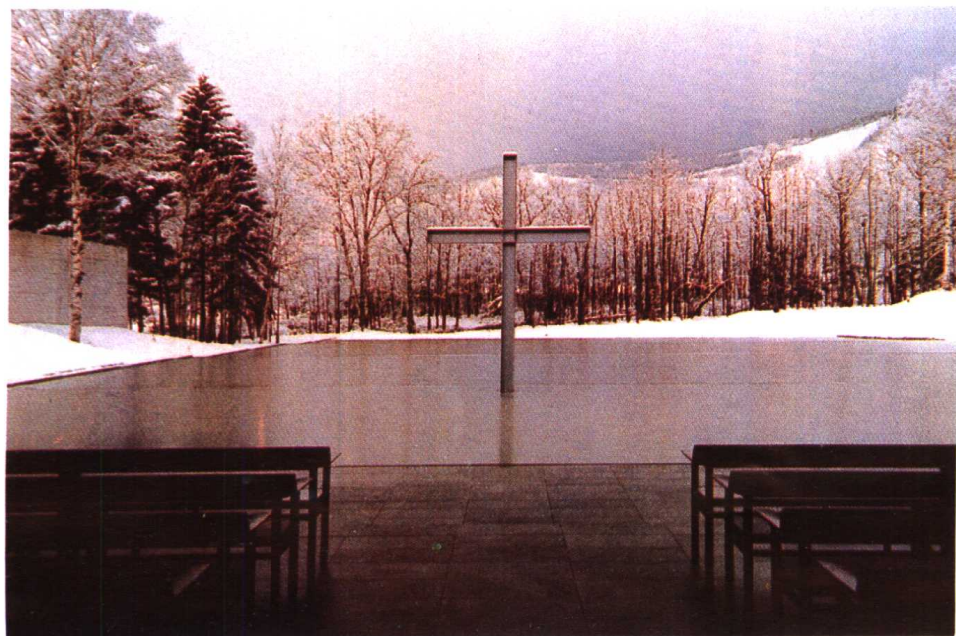


京都府立陶板名画展廊 空间流动的集大成者

安藤忠雄建筑作品选



水的教堂秋景



水的教堂冬景



透过中庭看飞鸟博物馆图书陈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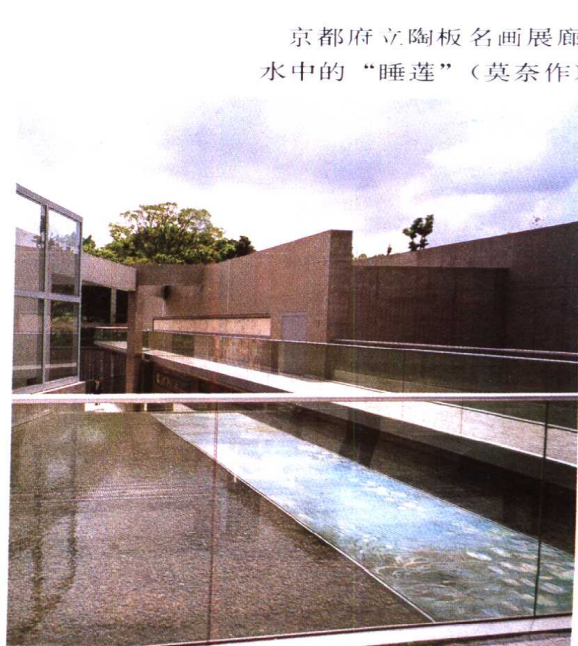
安藤忠雄建筑作品选



落日余晖下的飞鸟博物馆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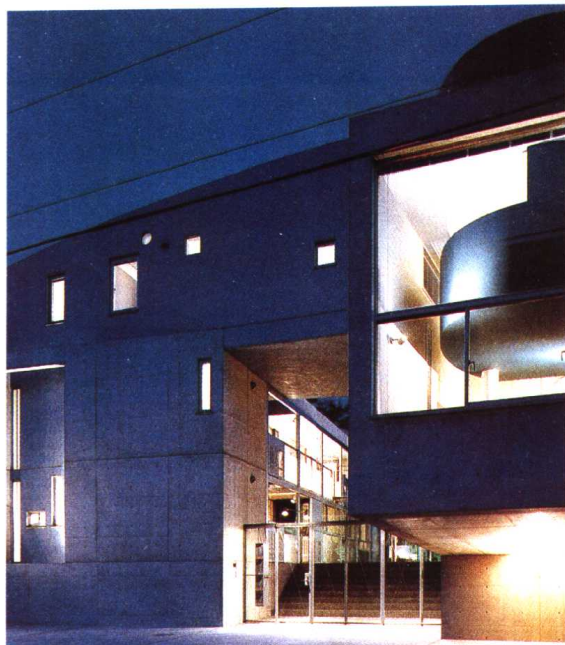


Suntory 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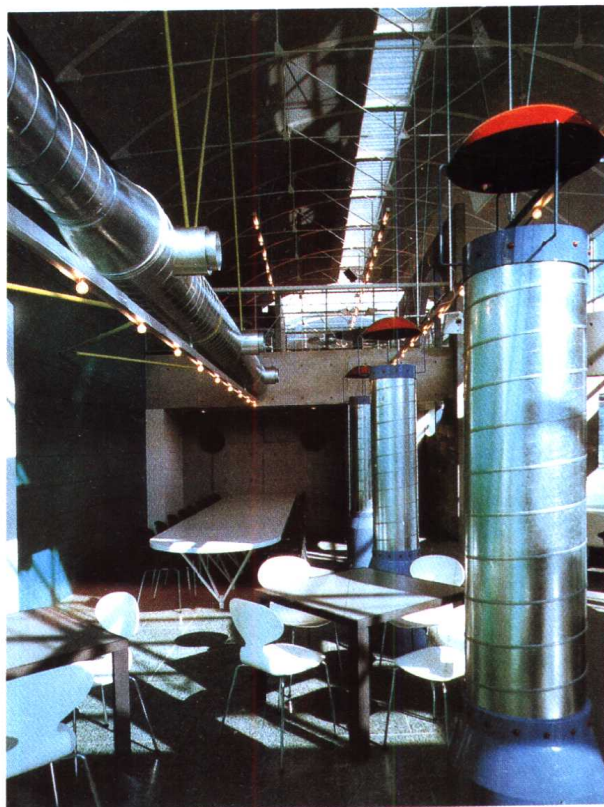


京都府立陶板名画展廊
水中的“睡莲”（莫奈作）

早川邦彦建筑作品选



用贺 A 公寓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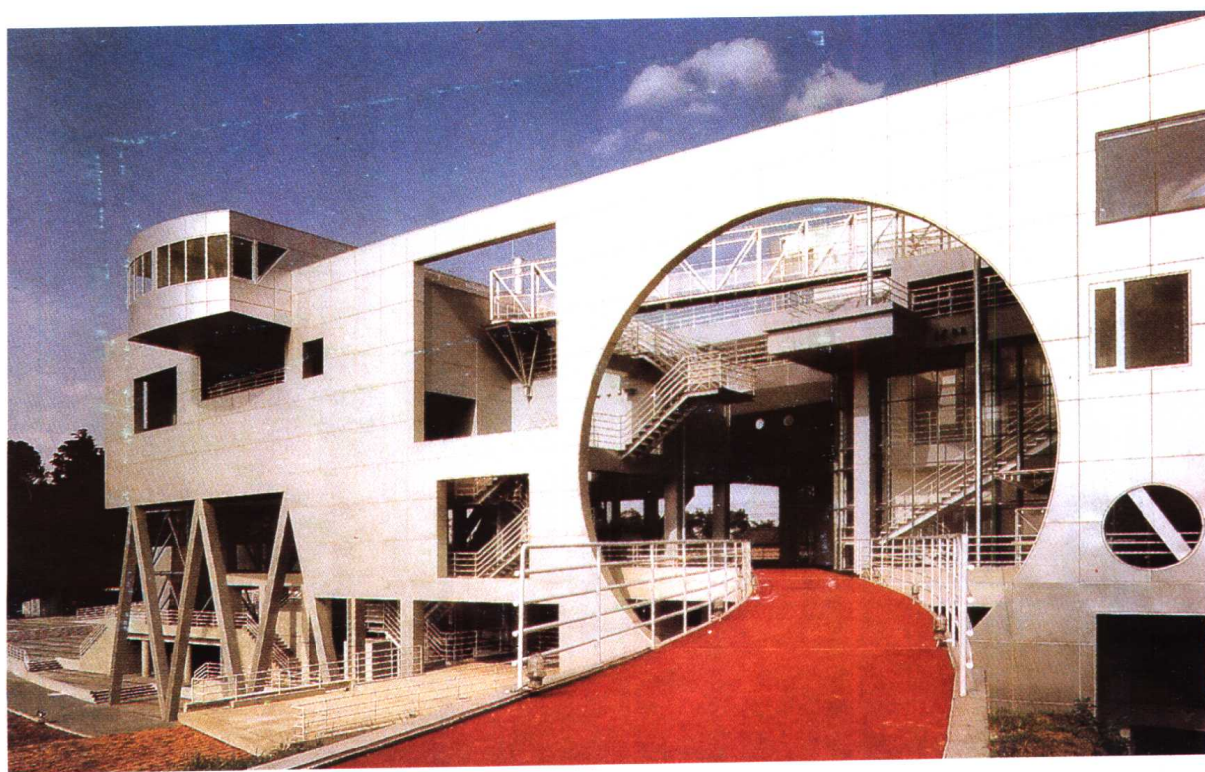
“转角”综合设施室内



成城交叉口的家室内



“中庭”集合住宅内的庭院



古河市体育中心西侧外观

建筑师

73

ARCHITECT

目录

建筑师

[建筑学术双月刊]

本刊顾问: 叶如棠
吴良镛
周干峙

主 编: 王伯扬
副 主 编: 于志公
王明贤
责任编辑: 徐 纺
装帧设计: 庄雪敏

编委会

主 任: 杨永生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志公	王伯扬
邓林翰	白佐民
刘宝仲	刘管平
吴竹涟	孟建民
洪铁城	栗德祥
黄汉民	常 青
彭一刚	谭志民
黎志涛	

“比较与差距”研讨会

4 发言摘要

——潘祖尧 顾孟潮 吴耀东 董 卫
邹德依 吕富珣 王贵祥 王小东
聂兰生 马国馨 赖德霖 仲德崑
杨永生

16 比较与差异

齐 康

19 放下包袱, 脚踏实地, 克勤克俭, 建设美好的未来

钟华楠

22 传统建筑文化与当代建筑创新

——创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建筑新风格

彭一刚

建筑设计方案

26 上海汇德丰国际金融中心方案 美国 A+A 建筑设计公司

31 辉映西北魂

——兰州世纪广场方案

王国梁

36 海鸥饭店与城市再开发

柳亦春 庄 慎

住宅设计研究

40 由住户人口结构看住宅厅室比例的适应性

李振宇 周 芹

传统建筑研究

43 传统建筑点景景观构成概述

马 兵

50 “历史地段”保护与天津老城厢更新改造问题

宋 昆 李倩枚

中国 建 筑 工 业 出 版 社

《 建 筑 师 》 编 辑 部 编 辑

(京)新登字 035 号
第73期1996年12月
(逢双月末出版)

封面: Suntory 博物馆室内空间 设计: 安藤忠雄 摄影: 王建国

建筑历史研究

- 57 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
错认错定（上）

曹 汛

建筑师札记

- 70 理解建筑师，尊重建筑师
72 北窗杂记（五十四）（五十五）
79 无限·另一个世界
——园林小品两则

张开济

窦 武

缪 朴

- 83 建筑师的法律素质
——美国注册建筑师制度有感之二

杨德昭

书丛纵横

- 90 《余畯南选集》序及编辑后记

外国建筑师介绍

- 93 当代日本杰出的建筑大师——安藤忠雄
108 色彩斑斓的生活空间
——日本建筑师早川邦彦建筑作品的印象

王建国

覃 力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开本：880×1230毫米 1/16

印张：7 彩插 2：字数：320千字

1996年12月第一版

199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7,000册 定价：18.00元

ISBN 7-112-02840-X

TU·2160 (795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ARCHITECT

发言摘要

编者按：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建筑师学会前任会长潘祖尧先生倡议并赞助的“建筑论坛”学术研讨会，继1995年10月在深圳市举行了以“建筑评论”为主题的第一次会议之后，于1996年8月在天津市由天津科技出版社主办了第二次研讨会，主题是“比较与差距”，由潘祖尧和本刊编委会主任杨永生主持。

参加会议的有：

东南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齐康**
东南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 **仲德崑**
新疆建筑设计院院长、高级建筑师 **王小东**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设计大师 **马国馨**
中国建筑学会高级建筑师 **顾孟潮**
北京建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教授 **王贵祥**
清华大学副教授、博士 **吕富珣**
清华大学博士 **赖德霖**
清华大学博士后 **吴耀东**
《建筑师》杂志副主编 **于志公**
天津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彭一刚**
天津大学教授 **聂兰生**
天津大学教授 **邹德依**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 **刘景樑**
光明日报社记者、散文作家 **韩小蕙**
天津科技出版社社长 **李定兴**
天津科技出版社总编 **宋淑萍**
天津科技出版社编辑 **宗洁、丁文红、**
赵虎、于冰

此外，虽因事未能到会，但在会前提交了论文的有：

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 **钟华楠**
旅美学者 **沈克宁**
清华大学博士后 **董卫**
莫斯科建筑学院博士生 **韩林飞**

这个研讨会将每年举办一次，一个主题，出一本书。《建筑与评论》一书已由天津科技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这次会的论文集《比较与差距》将于1997年1季度由该社出版。

有鉴于此，本刊除在本期内发表齐康、钟华楠和彭一刚的三篇论文外，以收到论文先后为序，摘要发表会上发言如下：

在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潘祖尧

举办中国建筑论坛的设想是在一个很凑巧的场合里产生的。1995年3月22日，我正在北京参加钟华楠先生为了新任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一职到京与中国建筑学会及有关单位的领导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晚上在下榻的西苑饭店咖啡厅与好友《建筑师》杂志编委会主任杨永生先生把酒言欢，我与杨先生谈及通过学会举办学术活动，在筹办工作上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如果能够举办一些小规模而又有深度的研讨会，通过私人赞助，便能对推动中国建筑设计起一些实际的作用，如古人的兰亭会。当时杨先生提意先在深圳举办一小型研讨会，邀请十至十二位建筑师、学者出席并提交论文，用两三天的时间去详细讨论提交的论文，会后可把论文出版，公诸于世，使更多的人受益。结果，《中国建筑论坛》就这样产生了。我认为，建筑评论是改进建筑设计的原动力，但可惜我们中国人对评论不太好感及接受。我觉得要跟上世界设计水平，我们就要放弃固执的思想，接受批评。所以，我提意把第一个论坛研讨会的主题定为“建筑评论”。这第一次研讨会于1995年10月在深圳举办得十分成功，而且全部论文在《建筑师》杂志第67期上刊登出来。今日，承蒙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支持，已经把全部论文印制成书，成为《中国建筑论坛》丛书第一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还愿意以后主办每年一次的中国建筑论坛研讨会及出版提交会议的论文。

今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比较与差距”，可算是把建筑评论再提高到另一台阶。通过一些例子深入研究我国建筑设计与国外的差距，从而对我国的建筑设计作分析并找出缺点或长处。作有建设性的比较首先要有不偏不倚的心态及丰富的设计经验，对国外的实例要作深入的了解，对国外的设计运作要熟悉，才能对国内的例子作出合理的评论。有比较才有进步，有比较才能把我国的建筑设计水平提高。国外有很多国家在建筑设计上，已经历过很多派别的演变，而日本却从传统建筑设计进展到模仿西方阶段，而且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我国从民国开始只滞留于模仿阶段，直至今今也摆脱不了模仿，谈何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呢？

比较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但没有比较就没有进步，我希望今天举办的研讨会，能激发比较学热，激发我国建筑师的雄心，努力创造出中国新的现代建筑风格！

1996年7月31日于香港

学科比较与建设问题

顾孟潮

首先要感谢“中国建筑论坛”的发起者、赞助者、支持者和组织者，他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参加“论坛”的交流我受到很大启发。我感觉论坛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交流空间，其特点是：层次高，无禁区，发挥了对话交流信息效率高的特点，具有多方面的相互选择性，而且做到了一步一个脚印。前一次论坛的成果已经及时出版。正如潘祖尧先生所讲，该论坛有“充电”作用。它为我们充了观点、思路、方法、资料线索等。短短两天的交流，当然不可能彻底解决某个问题，但提出重要问题却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我的论文内容是比较中外纪念性建筑。纪念性建筑是最难设计的，难度不在于技术，

而在思想性，在哲学，在观念。按照会议组织者的要求，论文讲过的我不再重复。现在我从学科比较角度，谈谈建筑学科的建设问题。

最近发生了三件令人深思的事。一件是，召开全国高等院校科技工作会议时，主管部门不通知建设口，答复的理由是建筑业没有什么高科技；第二件事是，费孝通回忆1947年梁思成曾请他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开社会学课，后来没开成，他为此感到“终生遗憾”，并强调应响应梁教授的召唤。因为他发现我国目前在城镇建设中大量存在着社会学问题；第三件事是，钱学森最近提出建立建筑科学技术大部门的问题，他认为，应当把建筑科学提高到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并驾齐驱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详见《建筑师》72期载钱学森《哲学建筑科学学术民主》）。

值得重视的是，尽管近年来国际上对人居环境、城市化、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建筑问题空前关注，而在我国，建筑业理应有它支柱产业地位，建筑科学应达到的支柱学科地位至今远远尚未实现。加强建筑学科的建设是我们极为迫切的任务。

另外，学科建设中对于规划设计的文化定位问题也需要明确。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主要讲文化构成中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这两部分，而对关系文化重视不够。岂不知，关系文化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中介环节，非常重要。在工程建设中，规划设计乃是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人们不应忘记“设计是工程建设的灵魂”这句名言。

中日现代建筑发展历程 的比较研究

吴耀东

就此次学术讨论会的议题，首先想说明的是，开展国际性的比较研究，应谨慎两类主导思想的偏颇。一是“崇洋媚外”，因为中国的确有其自身独特性的一面，盲目崇洋会导致脱离中国自身的土壤而放弃寻求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努力。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曰“国粹主义”，这会导致中国的固步自封，进而失去对异文化的深入研究和理解，从而阻碍中国现代建筑向前发展。

所谓“比较”，其内含是极其宽泛的，在很大程度上，中日两国的现代建筑发展历程可以说不存在可比性。“比较”是一过程，而不是结论，它应是一开放的研究体系。通过这一相互参照的过程，明确自身的立场和目标，以促进中国现代建筑向前发展。“比较”不可简单化和片面化。比较研究这一过程可以用下列词语来表述：相互参照、借鉴、启示。中日现代建筑的发展有着既相关而又不相同的出发点和发展历程。中国建筑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中国模式”的艰难的自我探索道路，而日本可以说是紧随欧美发展至今的。这样，战后日本现代建筑的发展便可以采取与西方类似的分期方式进行研究。中国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你无法在西方现代建筑研究的体系内对中国建筑的发展进行度量，从中国自身出发来研究中国应该是最为合适的。

关于日本现代建筑的研究值得提到的是，国内的一般研究过于着眼于以丹下健三为首的主流派建筑师，而忽视了对以村野藤吾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师的研究和关注。再者，探讨日本现代建筑如何与日本传统结合是国内研究惯常的关注点和出发点，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正是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推动了日本现代建筑潮流向前发展，并有了今天的成就和繁荣局面。因此，日本现代建筑的内容远比国内筛选出的研究内容丰富得多，也很值得我们更多地进行研究。

作为在中国接受过十余年的建筑教育后又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的我。亲身经历中

就包含着太多的比较、参证和自我反省的内容。基于此，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建筑教育、建筑研究的学术传统、建筑界的构图、建筑师的培养、建筑作品与建筑思想等课题进行了涉略。谈到建筑作品与建筑思想，可以说在当今日本，建筑作品的多元化与建筑思想的多元化是同步的，而建筑思想和设计哲学的提出，需要有对本国乃至世界建筑成长历史和发展动态的理解和把握，在理解他国和他人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目标和发展方向，进而把这种东西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中国的情况是，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是以政治导向为建筑导向，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动向和探索，但其背后建筑思想和设计哲学的贫困是可见一斑的，而这种建筑思想的贫困必然决定了我们的建筑是极其表象化的。此次的建筑学术研讨会是很好的动向之一。当今中国建筑界也应该象文艺界那样提出“精品”的课题，中国建筑师有责任探寻中国当代建筑的创作之路，但途径不止一条，这需要真正解放思想，需要宽容的精神，需要脚踏实地的建筑学术研究，更需要众人的共同努力。

北欧城市——过程与经验

董 卫

战后，北欧国家普遍实行以社会民主思想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政策，建立起以“瑞典模式”为象征的福利国家集团，它们的成功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城市的发展不仅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环境，也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及其运作方式的直接反映。从这个角度来了解当代北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有用经验，对于我们理解我国城市的发展趋势也许会有某些有益的启示。

平等与效率是西方用以衡量政府政策的基本原则。出于对这一原则的信念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关心，数十年来北欧各国政府都保持着对市场强有力的干预能力，以保证在促进市场发展的同时社会分配的公正性和社会福利的普遍性。而城市建设政策正是这种原则与信念的具体体现。综合北欧国家城市发展的经验，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 政府不仅是城市政策的制订者，也是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和管理者。特别在城市住宅建设方面，多年来政府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使每户都有一套良好的住房。除了制订政策目标外，北欧各国都有不同类型的政府机构或住宅公司以直接参与竞争的方式控制市场。如挪威的国家住宅银行和瑞典政府的非赢利性住宅公司所控制的本国住宅市场都高达80—90%左右，有效地防止了私人房地产商的投机行为，使绝大多数人能以合理的价格拥有自己的住房。

2. 民主化的规划及管理模式。伊莱亚森指出，北欧国家民主政府的基础之一是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因此城市规划的制订过程和执行过程都是公开的，任何建设项目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都难以实现。

3. 城市规划的目标是为了人。如何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将平等与效率的原则贯彻始终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例如，尽量避免在规划中将居民按社会阶层分区，并竭力解决因历史和市场原因所形成的这类问题，这是政府和规划师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一些城市在旧城中采取小规模의插建方式，将住宅、商业与办公等功能相混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4. 在借鉴国外经验时充分考虑到本国条件。本世纪以来，北欧城市规划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国外思想的传入。而数十年来随着现代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开创具有地方特色城市体系的呼声日趋高涨。结合其优良的环境优势，突出地强调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是近年来北欧各国城市建设中一个重要的特点。

在国际性和国家性建筑框架里的中国现代建筑

邹德侬

在不同的两个时期里，在两个不同国家的革命政权建立之初，出现了十分相似的两个建筑现象：用“复古主义建筑”批判“现代建筑”。

大约本世纪20年代之初，苏俄艺术在世界潮流的影响下，兴起了构成主义建筑，由于当局认为构成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随之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之加以批判，继而归结于倾向复古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建筑。

大约1950年代之初，新中国的建筑延续了1949年前的现代建筑。受苏联的影响，当时认为那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因而也对现代建筑进行了批判，最后同样也归结于倾向复古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建筑。这两个现象的共同起因是，以主观的政治因素为先导所形成的“国家性建筑”，抵制和批判现代建筑运动中的“国际性建筑”。

国家性建筑(National Architecture)是一个国家根据自身的条件所发展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国际性建筑(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是可以或者已经被国际吸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性建筑。如果说建筑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发展，那么国家性建筑更注重域内特定的条件，特别是民族、文化和自然甚至政治思想等条件。常说的“民族风格”(National Style)建筑属于国家性建筑之一；“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建筑则属于国际性建筑之一。“国家性建筑”和“国际性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是建筑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统一体，不存在谁先进谁落后之分；优秀的国家性建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可以被国际吸收的，上升为国际性建筑；另一种是基本上不可以在国际上普及或被广泛吸收的，它以自己的独特魅力，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者也。

我国的现代建筑起步不晚、水准不低、道路却十分坎坷。50年代的主要原因是，主观政治因素为先导的形式取向，违背建筑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向复古；在新时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的建筑设计市场里，主观经济因素为先导的形式取向，又干扰了客观的发展规律，出现新形式主义的“易操作行为”。

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成的三维社会活动空间，是包括建筑活动在内的一切活动须臾不能脱离的生存环境。在一个国家里，一定的政治条件，决定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如果这个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某项成果，在国际上有普遍意义，当别的国家吸收时，一般地说，其原先政治因素的作用就变成隐性的了。此时，这项成果就由国家性的变成了国际性的，原先具有特殊意义，如今具有了普遍意义。因此，国家性建筑和国际性建筑不是对立的关系，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现代艺术和现代建筑的发展过程证明如此。

我们期望着中国建筑走向世界，当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走向世界时，中国的建筑才有可能走向世界。中国不但应该用自己特殊的国家性建筑走向世界让人家欣赏，更应该以自己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性建筑走向世界让别人引进，在世纪交替之际，似乎应该作出这种思考。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项目内容)

苏联建筑及其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吕 富 珣

苏联建筑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发展道路，其间的曲折坦荡，成败得失，实在是很值得我们仔细地加以分析和研究。苏联建筑的发展历史大体上可以概括地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17~1932年，可称之为雄姿英发的前卫建筑阶段。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但却涌现出了大量的闪耀着理想光辉的设计思想和设计作品，它不仅在苏联建筑史上写下了最为精彩的篇章，而且也堪称是世界近现代建筑史的一段绝唱。

第二个阶段：从1933~1954年，可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复兴的阶段。30年代初，苏联政府举办了长达三年之久的苏维埃宫设计竞赛，通过这次竞赛，最终确立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建筑风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指导下，开始了苏联建筑界折衷主义与新古典主义长达20年之久的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三个阶段：从1955~1991年，以发达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崛起为主要特征。50年代中，苏联建筑界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现象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建筑的工业化、标准化等问题，确立了苏联建筑是以那些大量性建设的、与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类型作为质的标志的思想原则，从而为日后苏联建筑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70年代初，苏联思想理论界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切为了人的福利，一切为了人”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论。在它的影响下，苏联建筑开始走向一个多元化的新阶段。

苏联建筑对中国建筑，尤其是50年代的中国建筑，其影响是巨大的。学习苏联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盲目学习苏联的历史教训，无疑也是十分深刻的。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论及中苏两国建筑的差异，需要补充的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建筑在彻底摆脱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干扰的前提下，始终把大量性建筑的设计和建设放在首位，使苏联建筑在世界建筑之林表现出了鲜明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特色。那些满足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大量的住宅和社会文化福利建筑成为苏联建筑的代表和标志，从而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筑划清了界限，有了本质的不同。同时，在城市建设思想、城市规划原则、建筑设计理论、建筑美学、建筑教育思想和方法、建筑施工管理等方面，逐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具有强烈的苏联特色，符合苏联的国情，为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使得苏联建筑能独立地沿着与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的方向，走出了一条具有苏联特色的发展道路。

略论科学革命与西方建筑的发展

王 贵 祥

西方建筑空间与造型的发展历史，可以以17世纪作为一个分界线。17世纪之前的西方建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上古时代，即古代爱琴文化时期，这一时代的建筑，与巫术及神话相关联，追求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与宇宙契合的建筑空间；二是古代希腊与罗马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与建筑，杂糅着某种“人神交融”的气氛；三是中世纪，这

是一个在空间与造型上都是以“神”（上帝）为中心的建筑时代；四是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一个与中世纪相对应的以“人”为中心的建筑时代。

以17世纪为一个转折点，到20世纪的今天，西方建筑又经历了三次大的跳跃性发展，而这三个发展阶段，都是与西方历史上的科学革命分不开的。第一个阶段，是在牛顿时代即科学知识的第一次大综合时代之后。牛顿科学革命，是在哥白尼天文学革命的基础上完成的，哥白尼革命使人类认为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思想遭到了冲击，牛顿又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具有数学可知解性的理性化宇宙秩序观念。17与18世纪间流行于欧洲各国并在宫廷建筑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古典主义建筑与园林，就是以牛顿思想的具有理性秩序化与数学几何感为特征的。

第二个阶段，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尽管这一阶段的发展，是由多种原因如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社会变革等所造成，但从科学史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促成这一发展的是19世纪科学中的一场主要的革命——达尔文科学革命。它的震撼意义，主要在于对有史以来就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人类自我中心观念的挑战，在人的思想上引起的巨变超过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任何其他科学进步。这一时期以后的建筑师，开始反对把建筑列入艺术范畴，主张建筑以实用为主，并提出“形式服从功能”的口号，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东西都具有一种形状，或是说一种形式，一种外部的造型，而自然万物的形式都是由其功能所决定的，而“那里功能不变，形式就不变。”因此，建筑“就是要给予每个建筑物都有适合的和不错误的形式，这才是建筑创作的目的”，这些思想明显带有19世纪流行的达尔文学说影响的影子。本世纪20年代兴起的西方“现代建筑运动”，应当是上述这一建筑思潮的一个延续。

第三个阶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20世纪是一个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一个不断被惊人的激变所震撼的时期。20世纪初出现的相对论与量子论思想开始占据物理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并最终构成了一场科学革命。而以量子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使精神与物质、时间与空间、理性与感性等等传统的观念形态，变得更加矛盾复杂、模棱两可、混沌迷朦与不可思议。传统的宇宙秩序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物理学的发展。这一科学与思想上的巨大变革，在西方建筑中引起的变化，似乎正在显现，这就是继“现代建筑运动”之后的对建筑的复杂性、矛盾性、非理性、模糊性的认识与表现。这最初表现在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之中，渐渐又在新起的所谓“解构主义”的建筑中得到了体现。

中亚建筑折射中的思考

王小东

中亚建筑的残垣断壁使人产生对建筑的定义质疑而对其本质需要再认识。建筑的生命并不是永恒的，建筑被统治者奴役，如何承担它难以胜任的使命？从传统的建筑中我们究竟要继承什么，摒弃什么？在建筑与城市的新陈代谢中如何去完成建筑自身的原初使命？这就是本文的主题。

中亚建筑的发展受到如下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

一、地域自然环境的影响。

由于中亚基本上是处于干热性的气候地带，自然环境的严酷再加上建筑材料只能以生土，坯砖、陶瓷和少量的木材为主。所以形成了它的高密度、丰富多彩的几何体，空间处理随意自由，中庭空间的对内开放和对外的封闭性，对砖的熟练使用，对木材的精细加工，彩画和琉璃面砖的大量采用等特征。

二、近一千多年来，伊斯兰教的影响。

从公元712年阿拉伯人攻占撒马尔罕之后，在圣战的旗帜下经历了近一千年的时间，

直至15世纪火洲（即吐鲁番、哈密一带）皈依，伊斯兰教基本上成为中亚的最主要的宗教，以伊斯兰风格的巨大穹顶、柱廊而建成的清真寺、经学院、陵墓以及其它公共建筑，至今保存了不少。彩色琉璃面砖、马赛克，用阿拉伯几何图案纹身式的装饰形成了这一时期建筑的外表特征。

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

由于中亚是欧洲和亚洲的桥梁又通过西亚连通着地中海沿岸，南边毗邻着古老的印度，丝绸之路上汇集了孕育了全世界的黄河、恒河，两河以及地中海文明。所以在中亚建筑文化的积淀中，古希腊、罗马、西亚、佛教，中华文化、阿拉伯、伊斯兰都曾纷呈显现。表现出这一地区建筑风格的多元性、兼容性与随意性。

尽管在中亚我也曾看到不少美好的事，看到他们的长处以及好的建筑物，但不知为什么，那些致命的缺陷和不足之处总像一层驱赶不走的阴影。

从建筑空间来说，比例和尺度都被不适当地夸大了。建筑物一个个好像都在表演阅兵式，其形象使我想起欧洲新古典主义绘画中盛行的舞台姿势，想起中国的“赋”文体的铺排夸张。在建筑装饰和造型方面，纹身的图案以及对于传统构件夸张模仿后的组装，似乎是他们的特殊爱好，给人有一种做作的感觉。以建筑类型而言，纪念性建筑，纪念馆、纪念碑比比皆是，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但感觉到有些滥，尤其是纪念性雕塑人物的形象，很有些我国文化大革命中舞台上创造出的人物的样子。那么造成上述令人遗憾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认为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本身出了问题。是保守、封闭、不开放，造成了建筑创作思想的落后与僵化。

建筑就是要为人们提供生活和生存的空间，这是最原初的意义，但他们却给了建筑一种它无力承担的超负荷任务；让它（建筑）向人们表现更多的与它无关的观念和思想。这里出现了两条限定建筑创作的轨道：一条是建筑物的使用者如等待住房的老百姓，图书馆馆长、读者，商场的经理、顾客，大学的校长、学生、教授，火车站的管理人员和旅客等等，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使用这些建筑空间。而另一条轨道上是官员们、市长们或者比市长更高层的决策者。他们经常关心的是表现政权、政绩、显示气魄，并要求建筑表现更多的事，如民族团结、优越的制度、辉煌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工人农民的团结、光明的前途等等，这对于建筑和建筑师们来讲太强人所难了，而对原苏联的官员们来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装扮”是这类建筑的共性，假、大、空便成为必然。为此可以用总造价的一半或更多的资金添造一些毫无功能意义的符号空间。更遗憾的是这种打扮是后天性的，是硬加上去的。在考察中亚几国的现代建筑时，我经常习惯性的想象剥去它们“装扮”的外衣（如檐头、柱式、装饰、符号等）便发现他们的平、立、剖形成的空间一般比较简单。我想这大概是当年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内容和形式指导思想的体现吧！

中亚这块土地上的建筑尤其公共建筑是极具装饰传统的。精神上的需要是装饰出现的主要原因，建筑的装饰往往被局限在显示荣耀、华贵、等级方面。不幸的是中亚几国的建筑师们继承了这种“装饰”的衣钵。在那里，大大小小的建筑花格，金属的、混凝土的到处都是。好像离了它们就不叫建筑。铺花格成了建筑师的很无奈的手法。

建筑师们被束缚得穷路末路了。他们的创作被限定在仅表现宏伟的外观，夸张的运用传统构件、符号和太滥的装饰的歧途上去了，这是一条已经被走过的路！这不能责怪建筑师们，他们无法承担苏联解体的历史责任。是苏联模式的僵化的官僚政治的体制导致了这种无奈，导致了其建筑的呆板、虚假、做作、滥装饰、质量低劣、粗糙、装腔作势的一些倾向和属性。

不可否认原苏联模式曾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很多方面。这种模式带来的弊病不可能在我国的社会中全部被杜绝。因此在他们已走过而且走入死胡同的路上，如前文提到的限定建筑创作因素的双轨制，建筑无力承受的意识形态思想和观念的表达，舞台布景式的虚假、做作，过多的符号和装饰的运用等，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建筑物反映地域的、民族的、传统的、社会制度的特征和文化，是建筑本质所规定的，绝不能靠行政命令或圈定几种符号，作外皮的装扮就可以奏效。急功近利的舞台布景式的建筑语言不应该再有市场，更不能把宗教建筑的语言到处滥用。中亚几国的前车之鉴，值得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建筑师、建筑的主管者深思。

“真”是建筑创作的源泉，其实也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泉。有真才有情，只有在真实的世界中，有真挚的情感、真切的体会，使得一切看来平凡的东西都能发射出光彩。这种境地，并不是所有的人能享受得到的，所谓“高于生活”，我的理解是对真实生活认识的提高，是慧眼的提高，而不是装腔作势的拔高。今天我们与这种普通的，真实的建筑久违了。只有真实，回到建筑的原初目的，建筑作品才会和你作心灵的对话。只有瞬息万变的真实，才会有相对永恒的艺术。建筑师创作的任务，就是要从建筑原初的建造目的出发，创造一系列真实的、有生命的空间。

中日现代建筑发展历程对比

聂兰生

“比较与差距”研讨会如期在津举行，笔者有幸参加这次盛会，甚感欣慰。

当前我国建筑事业正值蓬勃发展时期，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也称得上“史无前例”了。建设高潮带来了创作的旺期，中国建筑师们欣逢盛世，不少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建筑师的队伍扩大了，素质也得到相应的提高。我们似乎应该有个总结和回顾，便于在下个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建筑能更上一层楼。但从目前看来，尚没有这个让我们反省和总结的机会。展开横向比较，找到今天的位置，客观地认识自我，做到知己知彼，才不至于陷入盲目。这大概就是这次研讨会的意义所在吧。

在建设、建设、再建设的大潮中，欣喜之余，也应冷静地想到，我们的建设大潮始于80年代。这正是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做的事情。在时间上我们毕竟滞后了许多，差距就从这里说起吧。

一个时期以来笔者曾从事于日本现代建筑发展历程的研究。两个亚洲邻国，尽管社会体制和经济基础不同，但在现代建筑发展历程中，却有不少相似之处。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掀起了第一次引进西方技术的热潮，30年之后，一个贫困落后的岛国，成为亚洲的军事强国。第二次引进高潮起自战后，20多年之后，一败涂地的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两次引进的成功，日本的建筑业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第一次引进，使手工业式的日本建筑作坊，转化成为现代企业，正规的建筑教育也从那时开始。第二次引进则使日本建筑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建筑舞台上的新星。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建筑师并没能在上述的时间段中赢得机会，我们的建筑教育和建筑创作活动滞后了。

尽管如此，仅就中日两国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回潮风波，在发生的时间和内容上看颇为相似。一提起日本建筑的传统回潮，不由人想起30年代的帝冠式，50年代传统与现代的争论和80年代和风文艺复兴的潮流。而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则能看到30年代中西合璧式的大型公共建筑，50年代反复古主义的大批判，以及80年代以来首都高层建筑上形形色色的琉璃瓦亭子。背景不同，但表现形式和所处的年代又极其接近。

潜藏于社会内部的，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心理，并不因为科学的发达而消失，它存于社会成员的行为和心理之中。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文化认同心理，常常会下意识地表达出来。在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传统回潮现象的反复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现代建筑冲破地域文化的限定而走向世界，但冲突与融合共存。50年代的日本建筑师出于使命感，使现代建筑日本化，当时还只停留在形象上的接近。进入60年代，建筑师们对本土的文化认识走向深层。更注意与环境的对话，特征和性格的分析，从而进行抽象、组合、变形。在全新的建筑形象中反映出日本固有的建筑文化特征。到了80年代，年轻一代建筑师则寻求与地域建设文化在精神上的契合。或许出自由衷的热爱，在下意识的表达中，反映出深层次的神韵。“形”已经离原点很远，但走近时，却能令人感到日本的